责编：沈辉 E-mail:zydxshenhui@2008.sina.com Tel:010—62806418

◆观 点

住房信息联网的阻力何在

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全国人大表示要更好地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加强房地产税立法。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做好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立法相关工作。尽管“房地产税”和大家普遍关注的“房产税”不太一样，但“住房信息联网”也必然是准确征税的要素之一。在限购政策普遍出台，保障房与商品房并行的情况下，只有充分、准确地掌握了每个人、每个家庭的住房情况，才能更公平地进行保障房分配，更严谨地落实限购政策。此外，只有参考数据准确无误，才能制定出更科学的楼市调控措施。

所以，作为健全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环节之一，实现全国住房信息联网是迟早要落下来的一只靴子。6年的时间不算短也不算太长，接下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能否实现恐怕是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

据报道，全国个人住房信息系统联网工作其实早在4年前就已经启动，但进展并不顺利。据报道，按照住建部原本的预想，去年6月底住房信息联网工程就要扩展到500个城市，但现在“大限”已过，这一目标依然“难产”。

在互联互通的网络时代，住房信息联网当然不存在太大的技术难题，其阻力毫无疑问来自于人而非机器。拥有多套房的业主担心联网的下一步就是征收房产税，其中财产来源不明的人更害怕房产曝光，这都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些既得利益者对相关政策的落实产生了阻碍。我们期待的是，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后相关部门能够迎难而上，拿出对抗阻力的勇气和智慧。必要的时候，住建部不妨求助于反贪机关——哪个部门、哪个地方、哪个人制造的阻力最大，那么涉嫌贪腐的可能性也就最大。

回顾以往，其他领域的一些规划也曾出现过延误。例如，早在1993年，我们就曾提出到2000年政府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要达到4%，但是最终的落实却晚了10多年——今年1月，发改委举行2014年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时才终于表示，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了4%。再比如火车票“一票难求”的问题，同样是一拖再拖，难以解决。那么这一次，相关部门能否正视住房信息联网将会遇到的困难，从而充分考虑、做足工作，准时完成时间表？如果制定出的时间表完成不了，那么一再损耗的只能是公众对相关部门的信心。

此外，从近年来爆出的房哥、房姐、房叔、房嫂等新闻来看，我国的一些地方存在户籍管理混乱的问题，个别人可能拥有数个身份证，这样的情况无疑会给全国住房信息联网带来巨大的阻碍。所以，要让住房信息联网的工作更加准确、更有意义，就要率先清理个人身份信息，注销重复户籍。

今年年初，公安部传来消息：在全国公安机关清理整顿户口的过程中，共发现和注销了79万个重复户口，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人员。79万不是小数，但我们想知道的是，拥有多个身份的“房×”当中还有没有漏网之鱼？对此，公安部不妨也出台一个时间表，说明到哪一年能够实现所有公民的“一人一证”。而这个时间节点，则理应在2020年实现全国住房信息联网之前。（2014年3月17日《法制晚报》庞岚）

从守规则开始

一台庞大、复杂的机器，其运转是否正常，取决于各部件能否有序运行。一个社会是否健康有序，则取决于整个社会能否按规则运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要从守规则开始。

规则，简单地说，就是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规则可以是由书面形式规定的成文条例；也可以是约定俗成，流传下来的不成文规定。规则是因为得到民众的普遍承认和遵守而存在的。行为规则要有助于一种秩序的型构，必须满足下述两个条件：第一，个人遵守这些规则；第二，个人运用这些规则去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

无可否认，当下社会，不少人缺乏规则意识，是非界限更是模糊不清。“利己为先”，是某些人固执秉承的行为准则；“凭着感觉走”，是一些人执拗的信条。质言之，就是一些人为人做事不太讲规则。因为规则意识差，不按规则办事，于是，有些人的行为就会失范，有些社会环节就会乱套。

一些人在道德与价值认同和行为规范上出现偏谬，且知行不合一，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个体对社会的归属感、认同感较差。特别是在当今社会，有少数人偏执地认为“我”与社会是割裂的，毫无关系。基于这种心理，他们缺乏对世界的温暖情怀，认为社会的好坏与个体的好坏毫无关联，所以其对自身行为失范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因为无廉耻感而无自我约束。二是长期以来中国人遵循更多的是软性的伦理，而非刚性的制度。加之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处于农耕时代，缺少纪律性和规范认同。三是历史上许多统治者制定规则，目的是想将其当作一种控制社会、管制百姓的工具；而在践行时，却“只许州官防火，不许百姓点灯”。这种基于管制思维而非契约精神确立的规则，在公众心目中自然难以内化成一种自觉的动力。

回顾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则一直体现在各种传统伦理价值观里。比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等；比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仔细审视这些价值取向，实则处处凸显“规则”二字。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归根结底，建设现代文明法治国家，就是要先从讲规则守规则开始。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会敬畏规则，遵守规则，内生于心，外化于行。久而久之，就会将外在的规则约束和价值倡导，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2014年3月17日《深圳特区报》惠铭生）

◆纵 横

失联飞机警示：科技有边界

载有239位乘客、其中154位同胞的马航失联飞机“人间蒸发”，不但往国人心中狠狠戳了一刀，也将咱们对人类科技进步日益膨胀的自信拦腰斩断。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刚刚露头便被相关方面否认。唯一还在“野蛮生长”的，是国人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在令人焦首煎心的这一周，“微江湖”上已经围绕“飞机去哪儿”，演绎出各种扑朔迷离、类似007的大片情节……

人类科技不是无远弗届、无所不能吗？不是传说中卫星厉害得都能看清地面上的轿车型号甚至人的眉毛胡子吗，偌大一架波音777，多国动用各种先进科技手段，怎么就迄今还一无所获呢？它是怎样躲过各路军用民用雷达，诡异地隐形了呢？

专家适时地出面，为焦灼的人们科普。原来，我们引以为傲的科技，是有清晰边界的，是相当无能为力的。比如卫星视力再好，也不能同时看遍四面八方，只有盯着某个具体目标才会看清。而马航飞机忽而泰国湾，忽而马来半岛，忽而马六甲，忽而印度洋，根本无法精准定位。《消失的法航》作者帕尔默向美国媒体形容搜索难度，相当于在美国宾州找辆小车大小的东西，现在又扩大到要在整个北美找，“而且还得在反光的水面找”。

结论就是，找到是反常的，找不到是正常的。

这样的时候，看到新闻图片上跪地为飞机祈祷的异国宗教信徒，当无力感袭来时，还能有所敬畏有所倚恃有所支撑。宗教或许是一些弱者最后的精神避难所。

那么，当科技有边界，我们“战天斗地”的野心是否也该收敛一下，用某种对自然的敬畏与谦卑，筑成自我约束的边界呢？

当今世界，科技的边界其实相当狭窄，它解决不了的问题实在太多——只是不像飞机失踪那样突如其来，痛人心扉，因而常常被轻慢地忽略了。

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特意提醒，“我们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可不是说向老天爷宣战，而是要向我们自身粗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来宣战”。他还用了“伤天害人”四个字，来形容违法偷排的行为。

是的，“伤天”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害人”。

咱们还是认了吧。相对于大自然，相对于地球与海洋，人类依然渺小，科技依然无力。为了追求GDP和眼前利益，我们“强大”到足够“伤天”的地步。天何言哉，只以灾异谴告——一切伤天行为，都反弹回来害了人。

我们的祖先，宗庙所祭不但有祖先，亦有郊社及山川之属，称为“外神”。现在想来，反而是一种大智慧。诗经《生民之什》篇说，“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是说敬畏上天的威怒，自警自戒，不敢有所轻慢戏谑；敬畏天降灾变的警喻，常自战栗，不敢随意驰驱无度。谆谆之言，耳提面命，让不肖子孙惭愧无地。

眼下，我们依然期待，那“隐形的翅膀”能够飞过绝望，在某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徘徊孤单着。

当时明月在，盼照彩云归。且让我们一起敬天爱人。（2014年3月15日《新民晚报》李泓冰）

◆文 坛

是什么让我们被歧视

最近常听到人们讨论“歧视”的问题，我发现它实际上很普遍地存在，这和人性中天然存在的“偏执”有关。

西方人买房子，会很介意上一任屋主是印度人或中国人，原因是厨房会有很浓的咖喱或酱油味。而一个老外在酒吧里喝多了，多数人都会猜他是个美国人，而不太可能是德国人。由此可见，全世界范围内，歧视不是单向的，每个种族、阶层对其他种族、阶层都会有偏见。

但好多所谓的“歧视”其实是因为文化上的隔阂，可能是在语言上无法沟通，或无法理解彼此的生活方式。遍布全球的唐人街、小印度、拉丁区、日本村、穆斯林社区……实际上正体现了这样的隔阂，统一种族的人聚集而居，主观上可能是为了生活方便，客观上却起到了缓解异族相斥的作用。

然而，一个确实值得注意的趋势是，最近针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大陆人的歧视和偏见开始越来越明显。在国外开车，有人拼命按喇叭，人们的第一个反应常常是，司机是不是中国来的？

更加奇怪的是，现在最歧视中国人的好像反而是中国人自己。

很多华人移民在国外为孩子找学校，最关心的问题是：“这所学校有没有中国学生？比例是多少？”如果答案是很多，他们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去。可能在潜意识里，他们已将自己和其他中国人作了区分：我不是“一般的中国人”，我不希望与这样的家庭为伍，也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在同一个学校上学。

不得不承认，这类歧视，背后表现出的是一种中国人整体性的道德失落——因为真正的歧视，包括偏见，正是基于一种道德优越感之上的居高临下。

显然，这种现象和人种无关。是因为中国人天生道德就差，还是因为中国文化自身的原因、所谓的“国民劣根性”？ 我不认为如此，中国传统文化有它的没落性，但也绝对不具有破坏性。老外都喜欢来中国看看长城、兵马俑，听听京戏，也觉得很好。

难道是我们读书少吗？好像也不是。否则为什么有些国家国民教育水平低下却没有显现出道德沦丧，而我们的有些博士后却明显素质低下呢？

我觉得这里面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环境。

法律最大的好处，是让人与人平等，人们相信法律可以保护自己，就会自觉地尊重法律，尊重他人和自尊，而不是去攀附权力。但当一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变成权力主导，就会导致法律失效，没有人再去相信法律，尊重规则，“不唯法，只唯权”。这时，就算你再成功，在权力面前也会变得连蚂蚁都不如；相反，如果法律完备，就算我做了错事，认罪了，也还可以去申辩我应享有的权利。

在我们的社会里，无论是在生活还是企业上遇到问题，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找人找关系，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社会是由权力来维持的。长久下来，就导致了一种大范围的道德败坏。

在一些欧美国家，很多没什么背景的华人移民可以很容易通过自身努力而成为“杰出人士”，儒雅有礼，事业春风得意，而且备受尊重。但当我和几个国内来的“土豪”朋友在加拿大吃饭，他们却满腹抱怨，说外国的医疗服务太差，排队都要排几个小时。显然他们是拿在国内享受到的“特权”和这里的“平权”相比。这些“土豪”所生长的其中的整个生态体系，充斥的全是“成功学”，只有得失，不论是非。按照这个逻辑，富了就代表你成功了，成功了就可以获得别人的尊敬，但现实情况又是怎样呢？

今天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口构成已经不再以劳工为主，相反，加拿大70%以上的豪宅都是被中国人买走的。然而，你发现就算别人把房子卖给了你，却没有在心里尊重你。

一位华人女性在加拿大开豪车违反了交规，英语说得不利索，就断定警察罚她是因为嫉妒她有钱——这种逻辑多可笑！当我们穷得只剩下“钱”、以为钱可以成为万能通行证时，就注定了会被人所轻视。

意识不到这一点，还是固守“以利益为核心”的思维，结果只能是与这个世界越来越格格不入。（2014年3月14日《经济观察报》周航）

◆评 论

“官不聊生”并不真实

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下达，“苍蝇”“老虎”被不断曝光，所谓“官不聊生”的说法也不胫而走。一家电视台于全国两会期间开设了一个对话节目，采访者将一个问题抛给了我国法学泰斗江平先生：您如何看待当下“官不聊生”的说法？

暂且搁置江平先生的回答。我愿先以自己现实中的经验回应这一问。我一位政府官员朋友就与我闲聊，这些日子在外吃饭（当然是公费）颇不容易，进出包房都鬼鬼祟祟的，只怕被人拍照。又说清明快到了，上坟还得找辆私家车，以免公车私用曝光。说过这些，朋友自嘲：现在真是“官不聊生”呵！

我当然对此前官员们的生存状态略知一二。多年前曾通过熟人关系到某县一游，竟惊动了一县之首长。虽不过为区区县处级官员，那种动用公家资源有如掏私囊待客的做派（可能自掏腰包并非如此大方），令我等瞠目。而毫不夸张地说，放眼四顾，不受约束的公权力，于中国大陆处处皆然。

如果硬要拿“官不聊生”说事，香港倒有现成的例子。香港财政司前司长梁锦松的请辞，不过因购车不报税；廉政公署官员汤显明仅因宴请内地官员超标就下了台，问题是，先前在内地，哪里去找这样的“标准”，谁又拿这“标准”当回事？

回到江平先生的回答（大意）：中国现在的整治贪腐还仅是开始，离深入到基层还早着呢，何来“官不聊生”。真以为“官不聊生”者，还是以获取利益为当官之目的，这于公于私都极其危险矣；若如此，又何必选择当官！

我想说的都在江平先生话里。仅提醒一点：且看当下世间奔那一官半职的趋之若鹜，便知所谓的“官不聊生”到底与真实有多远。（2014年3月17日《长江日报》梅明蕾）

◆史海钩沉

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按照惯例，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分6个组进行讨论。

由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此次会议原来只安排了三项议程：一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是商定1979、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按照这个议程，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并不涉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根本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开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可能发生重大转折。

关键时刻，邓小平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2月13日下午4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对这个讲话非常重视，在10月份出访日本之前，他就找有关的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让他们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起草一个初稿。这个初稿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就写了出来。但会议进展很快，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会上又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需要及时地作出回答。这些问题不解决，认识就不能统一，全党就不能很好地团结起来、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邓小平根据会上提出的新问题和国内外的反映，自己用铅笔写了一个约500字的提纲，然后于12月2日找有关同志去谈想法。这个提纲共七个部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加强责任制，搞几定；新的问题。

12月5日，他又找起草者谈文稿的修改，讲了四个问题：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向前看；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先后两次谈话，明确了讲话稿的写法和内容，确定了基本框架。

12月9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起草者，逐字逐句地进行审阅修改，又谈了很多重要的意见，文稿的内容基本确定。后来，他又几次约见起草者，谈了一些修改意见，最后作了一些修改和润色加工。从讲话稿的起草过程来看，这个讲话完全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根据他的思想写成的。其中许多重要的话，都是他本人的原话。讲话围绕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着重讲了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向前看、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和政策。

关于解放思想，邓小平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针对人们最为关注的真理标准讨论问题，邓小平再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明确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关于民主问题，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也无法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时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关于向前看，邓小平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强调，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没必要。

关于研究和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还针对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向全党郑重提出了改革的呼吁。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不仅提出并回答了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关注的事涉历史转折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为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总结，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指导思想，因而它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的主旨和一系列重要观点，为全会所接受并被写入全会公报，成为指导全面拨乱反正和制定改革开放新政策的总的指导方针。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无不受到极大的鼓舞，有人曾回忆说：“当时听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就兴奋地预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五大报告将这个讲话誉之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2014年3月12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周锟）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 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